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历史与记忆

[法] 雅克·勒高夫 (Jacques Le Goff) / 著
方仁杰 倪复生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历史与记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与记忆/[法]勒高夫著;方仁杰,倪复生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ISBN 978-7-300-11844-4

I. ①历…

II. ①勒…②方…③倪…

III. ①史学-研究

IV. ①K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0939号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历史与记忆

[法]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著

方仁杰 倪复生译

Lishi yu Jiay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398(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开本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印 张	20插页2	印 次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260 000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断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当前，全球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互动效应更为明显。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新中国出版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所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这些译丛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同时，我们又推出了这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系列，旨在译介国外当代学术名著。所谓“当代”，一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名著”，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成为研究者的必读著作。我们希望经过不断的筛选和积累，使这套丛书成为当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殿堂。

由于本套丛书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未经历史的充分淘洗，加之判断标准见仁见智，以及选择视野的局限，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推荐，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深信，经过学界同仁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必将日臻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法语版序言

本书中的这些文章最初都是意大利文本，收录在意大利都灵 Giulio Einaudi 出版社 1977—1982 年期间编纂的各册《百科全书》中。十篇文章全被《百科全书》收录，意义自然不凡。这些文章分别是《历史》、《记忆》、《古代/现代》、《过去/现在》、《进步/反动》、《神话时代》、《末世论》、《没落》、《历法》、《文献/文物》等。1986 年，都灵 Einaudi 出版社将这十篇文章辑集成册出版，仍使用意大利文，书名《历史与记忆》。

本书以其中四篇（《历史》、《记忆》、《古代/现代》、《过去/现在》）文章为骨架，形成了对历史的一个完整思考。文章首先关注的是信息，这在百科全书当中最为常见。本书开篇便是历史的历史，或者说是历史活动、历史思想、历史学家职业史。而首先要深入探讨的便是人类经历过的“客观的”历史——或曰人类创造的或曰奴役人类的“客观的”历史——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通过这样一个历史学科——暂不称之为“科学”——历史学家们和一些职业人士（最起码要是专业性的）便可以 10 设法去驾驭过去的历史，可以对之进行思考、进行解释。

在开始研究之前，需要清楚历史与回忆之间的关系。一些直观的



看法似乎彼此都很相似，因为它们基本都是依据回忆。回忆比历史更真切、更“真实”，而历史则更像是杜撰的；回忆倚重的是对记忆进行加工，而历史实际上是对过去的一种编排，是按照社会结构、意识形态、政治来进行的一种编排，历史学家们的责任便是在此。事实上，历史是过去，是现在，是世间的这或那，是真相的敌人，是政治有意识操纵的产物。民族主义、各种偏见在左右着历史，处在发展中的史学的历史范畴（传统历史编纂的演化和批判形式）有时候需要良知发现，需要对历史作品、作品的时代背景、作品前后的时代背景之间的关系加以研究，因为这些时代决定着（该历史的）含义。尽管存在着各种类型的历史编纂，但历史学科并不因此而减少对客观性的探究，仍然要以还原历史“真相”为支点。回忆是历史的原材料。回忆存在于话语、文字和脑海中，它是历史学家汲取素材的源泉。由于回忆通常是无意识的，因而事实上回忆最容易受到时代和社会的操纵，因为时代和社会只关心历史学科本身。历史学科由此承担起了反哺回忆的责任，社会、个人都卷入进了这场浩大的记忆与忘却的辩证进程之中。¹¹历史学家应主动出来解释记忆和忘却，对其进行深究，以使之成为一门学问。过分地推崇回忆，也就等于将自己淹没在诡异的时空中。

我认为，历史学家的核心工作就是去探究一些相对应的概念的历史，这非常重要。“过去/现在”这对概念是根本，因为“回忆/历史”便是以它们之间的差异作为基础的，过去/现在贯穿着人类历史知识的始终，但在儿童心理学中，回忆与历史之间的差异却是以其他为基础的，而且表现形式也不一样。称其为基本的概念，是因为历史研究就是在过去—现在、现在—过去之间不断往复的过程中完善的。制定这项工作的规则，厘清这“逆推式”方法的使用条件是历史学家的事情，在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看来，保持与过去的距离感和厚重感，是将我们与过去隔离开的一个合理的而且是富有成效的方法，这就是克罗齐（Benedetto Croce）^①所谓的“历史就在当代”。但同

^① 克罗齐，1856—1952，20世纪意大利哲学家。——译者注

时也要对偶然的和断裂的事物保持警惕。历史的历史应是我的朋友 G. 阿诺蒂 (Girolamo Arnaldi) 所谓的“解放过去”，而不是黑格尔所言的“历史的负担”。

过去/现在间的差异得到了集体意识与历史学家的认同，但这种认同绝少是中性的。对于某些人而言，过去是黄金岁月，是美德和纯真堪称典范的年代，是伟大祖先们的时代；而对于另外一些人而言，过去是野蛮的、古板的，是精神平庸与体格侏儒的年代，是老古董们和落伍者的安乐窝。依此推理，现在在他们眼中，要么是进步、创造和文明的祥和年代，要么就是恣意革新的危险年代或颓废的糟糕年代。上述结论的支持者们总能在历史或者现实中找到支撑自己判断的依据。诚然，西方世界正逐渐地走出了人类发展过程中漫长的意识形态阶段，在 17 和 18 世纪，古今的辩证似乎是戛然而止了，但在过去的世纪里，在人类进步旗帜下形成的思想却依旧遭到了传统主义者、“反革命主义者”或“反动分子”们的反对，新现的古今之争极大地地震动了西方史学的神经。对这一系列的现代性问题和新争议进行研究也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12

我很清楚，进行此类研究，尤其是在西方思想和历史作品领域内进行此类研究，要比研究其他文明略微容易些，况且，西方文明对历史演变要更为敏感一些。但我仍然要设法了解或者间接了解其他社会对待历史的立场，其中甚至包括那些被称作是“无历史的”社会，也就是被历史学家们丢给人种学家和人类学家们去研究的社会。时代的更替导致我们对差异、多样化、其他社会更为敏感，因此走出西方、放眼世界也就显得更加必要。

显然，历史学科要求有宽阔的视野，足以全面覆盖人类“客观的”历史演化，从中我得出两项基本的但却是长期的且刚起步的任务。一是比较史学，唯有它才能赋予各种近乎苛刻的历史理念以中肯的内涵。只有它既要求大而全，又推崇特异性；既要探求规律，又热衷于偶然性和合理性；既要陈述概念，又要陈述历史。比较史学虽然如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所愿蓬勃发展起来，不过它却远 13



离了另一个任务：普通史学。

读者也许会猜测，我写这些文章的初衷是否就是为了描述历史学家职业以及历史研究的变迁，我本人的经历、作品和我的选择对此已作出了很好的注释。我所工作的、传承历史知识的团队对当今的史学革新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就是所谓的“年鉴学派”。该学派的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马克·布洛赫于1929年创办了《年鉴》杂志，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曾在1956—1969年期间任《年鉴》的主编。因此我便有幸被请去和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合作做了三卷的《历史研究》（1974）。得益于众多历史学家的热忱参与，“年鉴学派”的影响与日俱增，而《历史研究》则为之提供了舞台，期间，为了拓宽历史学领域，《历史研究》也做了很多的探索。

在此我不想回味往事，也不想为社会学、史学以及大家有所耳闻的“年鉴学派”所遭遇到的信任危机而辩解，我是想以个人名义、以14 “年鉴学派”同仁们的名义来纪念《年鉴》创刊60周年。我还想说的是，这些文章所讨论的历史学就是所谓的历史人类学，即借助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以期能深入到物质的、精神的、政治的历史现实的最深处，以期维护人类和知识结构的完整性。^①

显然，人们将看到的这些文章均带有创作时期的印记。作为历史素材的源泉，“进步”概念在20世纪由于媒体的鼓噪而受到普遍的憎恶，进步由此受到了损害，西方历史理念也因这场概念危机而受到了重创。从集中营到酷刑，从纳粹死亡集中营到种族隔离，再到种族主义，从恐怖的战争到可怕的饥荒，这一幕幕让人失去了由线性的、持续的和普遍的进步所带来自豪感，体现在尖端科技上的进步尤为明显。有了对各大洲、各社会、第三世界及其历史的深刻认识之后，人类社会以单一模式发展的理念随即便烟消云散了。

从较严肃的历史学方法论出发，人们既会发现有所谓的“历史片

^① 参见比尔基埃：《历史人类学导论》，见《历史学科大辞典》，52～60页，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P. U. F.），1986。

段”的出现，也会见到历史学传统形式的“回归”，如“叙述”的回归、“事件”的回归、“编年学”的回归、“政治”的回归、“传记”的回归。我在此仅想说，自我批判和修正也应该在历史学家们的领域中展开，目的是使这块领域能够更加富有生机，而适当地作些“回归”，也不应被视作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那些“死不悔改，执迷不悟”的流亡贵族们的“回归”。历史学需要的是变异，而不是反动力。为了实现必要的目标，抵御倒退的行为，历史学家应当保持清醒与警觉，要拿出勇气来武装自己。 15

历史学的前沿，尽管共见在增加，但它仍是战斗的前沿。这是理念之战，为的是更好地“研究历史”。

1988 年元月

1986 年意大利语版前言

历史学一词招致了六方面的疑问：

17

(1) 人类社会实际的历史即“自然的”或“客观的”历史与历史学科即为了描述、思考与解释这类演变所作的科学探索，二者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差异给一个模糊学科的出现提供了可能，这即是历史哲学。另外，自 20 世纪初以来，尤其是近 20 年以来，作为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研究史学自身演变的“历史的历史”或者“历史编纂学”与历史学科同步发展起来了。

(2) 历史学与时间、时代是什么样的关系？这里的时间是“自然界的”有着节气轮替的时间，还是由社会与个人规定的实际时间？发出这样的疑问，一则是为了掌握时间，各社会与文明都发明出了一种基本的工具：历法，历法本身也是历史学的一个基本材料；再则是如今的历史学家对研究历史与回忆之间的关系情有独钟。

(3) 历史学的辩证法可以被概括为过去与现在间的一种对话或对比。就像古与今、进步与反动的对比一样，这种对比也不是中肯的，它一般是为了暗示或阐述一种价值化体系。从远古到 18 世纪，围绕着“没落”这一概念，一种历史悲观主义的论调一直在不断地滋生着

18



发展着，这在 20 世纪的某些历史学理念中也得到了反映。与之相反的是，源自于进步理念的一种历史乐观主义的观点在启蒙时代也得到了肯定，不过，在 20 世纪下半叶，进步理念遭遇到了危机。那么，历史学有方向么？有历史学的方向么？

(4) 历史学无法预言、预见未来。与另一种新“学科”未来学相比，历史学应当如何定位？事实上，历史学如妄言人类与世界的起点与终点，它便不再是科学。至于起点，历史学解释得有点玄奥：创世论、黄金时代、神秘时代，而最新的解释便是有着科学外衣的“大爆炸”理论。至于终点，历史学便要让位于宗教学说，特别是救赎论宗教，它已经构建好了一种“终极末世论”，即末世学，或者让位于进步乌托邦，其原理便是马克思主义，它将一个有关方向的意识形态与历史的终点（共产主义、无阶级社会、国际主义）相提并论。然而，通过历史学家们的实践，对起源概念的批判之声渐起，发生观（Genèse）大有取代起源论（Origines）之势。

19 (5) 通过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接触，如今历史学家有界定各类不同历史时期的倾向。对于事件，人们重新有了兴趣，反向来看，尤其从远景来看，这的确诱人。这样的远景促使部分历史学家，或源于结构主义观点，或受人类学的启发，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存在着一个“几乎静止的”历史。但问题是，可能有这样一个静止的历史么？历史与结构主义（或这些结构主义）有什么样的关系？再者，难道就不可能有一个更广泛的“否认历史”的运动么？

(6) 历史是人类史的理念已经被另一种理念——历史是关于社会的人的科学——所取代了，但是否只有、只可能有一部人类史呢？气候历史已经发展起来了，难道人们不应当再去发展一部自然史吗？

※ ※ ※ ※ ※ ※

(1) 尽管它在西方国家出生，传统上认为它是在古希腊出生（出生于约公元前 5 世纪的希罗多德 [Hérodote]，若非是第一个历史学家，至少也是“历史学之父”），但它却可以追溯到近东、中东和远东的远古帝国阶段，历史学科与数学、自然科学、生命科学等不同，它

所依托的是既非构造出来的也非观察出来的事实，希腊语 *historiē*，其印欧语系的词根为 *wid-weid-(voir)*，表明其本义就是“所见”。但就是这点，人们仍要“调查”、“求证”。历史始于叙述，而叙述就是某人说：“我看见过，我听见过。”历史一叙述与历史一见证这种特征在历史学科的发展过程中从未中断过。但令人不解的是，如今人们 20 对此却加以批判，并想用解释来替换陈述，同时通过“事件的回归”（P. Nora）来替换复兴中的历史一见证，这“事件的回归”涉及了新传媒，涉及了历史学记者的出现以及“即时历史”的发展。

然而，历史学自古以来，就是要通过收集“书面资料”以获取证据，但其范围业已超越了历史学家们能够眼见、耳听、口传过去一个或半个世纪的知识的极限了。图书馆以及档案馆的建立为历史学提供了材料。自中世纪蹒跚起步开始（如 Guené^①），到 17 世纪末的杜·孔日（Du Cange, 1610—1688）、让·马比荣（Jean Mabillon）、圣莫尔修道院（Saint-Maur）的修士们以及莫拉托里（Mauratori）等等，人们设计出了“科学的”评判方法，历史学由此也被赋予了技术意义上的“科学”含义。事实上，没有不“博采众家”的历史学。但在 20 世纪，人们却对历史事实观进行了批判，因为它不是既定的目的，而是来自于历史学家的构建。同样，人们如今又在批判文献观，因为它不是一个原始的、客观的、中肯的材料，它是过去社会的权力意志在回忆和未来中的体现，“文献就是纪念碑”（Foucault, *Le Goff*）。而与此同时文献领域扩大了。传统历史将文献领域局限于考古发掘和文档上，而考古学又与史学严重脱节。如今，文献范畴扩展到了言语、图像和手势，随后又陆续收录了“口头档案”和“人种学文章”。依靠计算机，文献归档实现了革命。“计量史学”之所以能涵盖 21 到人口统计学、经济学甚至是文化史学，依靠的是先进的统计学手段以及计算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

自古以来，对于“历史学现实”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差异问题，哲

① Guené，中世纪历史学家。——译者注



学家与历史学家们纷纷提出了各种全面的系统的阐释（从极端意义上而言，这些人也包括 20 世纪斯宾格勒 [Oswald Spengler]，韦伯 [Max Weber, 1864—1920]，克罗齐，葛兰西 [Gramsci, 1891—1937]，汤因比 [Toynbee]，阿隆 [Raymond Aron] 等人）。大部分的历史学家对于历史哲学多少流露出一些不屑，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人们抛弃了曾风光一时的德国（兰克 [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和法国（朗格卢瓦 [Langlois] 和塞诺博 [Seignobos]）的历史编纂学实证主义，转而去拥护问题—历史学，并将自己定位在意识形态与实用主义之间（Febvre）。

为了驾驭历史学的发展，使之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历史学家们以及哲学家们自古以来便竭尽所能以寻找、界定历史规律。最为深入的同时也是最为失败的尝试便是那古老的基督教的“神意说理论”（博絮埃 [Bossuet]^①）以及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一门历史决定论的伪科学，尽管人们并未触及马克思的历史规律（这与谈及列宁恰恰相反），但这种看法每天都在被大量的事实和历史思考所驳斥。

22 反之，由果及因的理性的历史解读，历史长河中存在的规律（这²²是在不同的社会及结构间进行历史比较的基础）以及对构建单一模式的否定（如历史学范畴扩展到整个世界所引起的复杂化、人种学的影响、对相互差异的重视、对他者的尊重等都是这种情况）等等，都使得历史学的回归避免沦为一个纯粹的叙述。

历史学家的处境还说明了为何有关历史学家“客观性”的问题被一再提起。如在构建历史事实以及处理文献时恪守良知，那么出现在历史知识构建中的各个层次上的人为操控便无处藏身。但是这种结论不应当导致一种对于历史客观性的普遍怀疑主义，也不应当导致史学中的“真相”观遭到抛弃。持续地揭露和曝光史学中的骗局和歪曲让人对客观性充满乐观。

^① 博絮埃，17 世纪法国天主教教士、演说家，支持法王路易十四世，鼓吹绝对君权论。——译者注

不可否认，客观性有否未来也即等于历史学家们有否未来，但这不应当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史学“也”是一种社会实践（Cer-teau），也就是说，尽管人们要批判那站在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或庸俗的反动主义立场上将政治干预与历史科学混淆在一起的做法，但史学家们对世界历史的解读仍是出自于其改造世界的愿望（例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传统，还有其他的如托克维尔〔Tocqueville〕及韦伯所认为的应将历史分析与政治昌明相联系的观点），这点也是合理的。

对历史事实观的批判还导致“历史真相”的出现，而这正是长期以来被史学家们所忽视的。在政治史、社会经济史、文化史之外，又出现了一种“表述”（représentations）史。这种史学有着多种的外衣，如社会整体观历史或者“意识形态”史，与某个社会、某个时代以及某种社会范畴相对应的精神结构史或者“精神”史，与文本、言语和手势无关而与图像有关的意思生产史或者“想象”史，这种想象史将文学文献、艺术文献以及历史文献完全同等对待，只要重视它们各自的特点即可。另外，还有主旨为了发掘真相的行为、实践与礼仪史或者说“符号”史，这种史学或许会在某天催生出一部精神分析史来，不过对它的科学地位问题至今仍未达成一致意见。不过，最终还是要将历史学科、历史编纂学以及历史的历史一同纳入到历史的视角中来加以考察。²³

所有涉及史学的新情况均有着丰富的内涵，但其中也有两个错误需加以回避。避免将表述的历史现实作为其他现实的附庸物，如果人们认为只有这样，其他的现实才具有本源的地位（物质、经济现实），那么就需要抛弃基础与上层建筑这样的假命题。不过不能过分夸大这新的现实，避免用历史的发动机这样一个绝对的称呼来对待它。一种有效的历史阐释首先要承认所有的历史现实（包括经济）都包含有符号，另外，还要将历史表述与现实加以比较，即与该阐释所表述的现实、历史学家所理解的现实以及文献所陈述的现实相比较。例如，将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事件和实践相比较。一切历史都应当是“社会的”历史。²⁴



最后，鉴于历史事件具有“唯一性”，这就需要历史学家将叙述与阐释加以结合使用，历史由此便具有了文学的模样，历史是一种艺术，同时也是一门科学。尽管自远古以来一直至 19 世纪，从修昔底德（Thucydide）到米什莱（Michelet），这点都未曾改变过，但到了 20 世纪情况却变了。随着历史学科中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历史学家们的杜撰也变得越来越艰难。“历史撰写”一直是存在的，但却不为历史学家所专有。

25 (2) 史学最基本的素材便是时间。很久以来，编年学都在扮演着一个基础的角色。它如同是历史的导线、史学的补充。编年学基本的工具便是历法，但历法已非为历史学家所独有，它是社会运转基本的时间背景。历法是人类社会努力的产物，为的是掌握自然的时间、月亮和太阳的自然运动、季节变换以及昼夜交替等。其中衔接最为有效的是小时、星期，但它们却与文化有关，而非与自然。历法是历史的产物，是历史的表达，它诞生自人类（或节日）的宗教与神话，它与科技的进步（时间测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息息相关。历法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努力，历法将神话的、自然的、永恒轮回的周期性的时间转变成线性的时间，并用年组如五年、四年、百年、时代等为计时单位将时间长度加以界定。与历史密切相关的主要有两点：一是编年学的起点（罗马的建成，基督教历纪元、伊斯兰教历纪元出现）；二是尝试进行“历史分期”并创造计时单位以来衡量时间，如一天 24 小时，世纪等。如今，在史学时间度量的背景下，史学倾向于在哲学、科学、个人和集体经验等材料的分析中引入时间长度、实际时间、倍数的及相对的时间，引入主观的或符号的时间概念。但面对回忆中的老时间，这充盈着历史且丰富着历史的老时间，却让历史学时间举棋不定。

(3—4) 过去/现在这对概念对时间感来说不可或缺。对儿童来说，“懂得时间即意味着可从现在中得到解放”（Piaget）。但史学的时间并非心理学上的时间，也非是语言学上的时间。然而，对这两门科学中时间性的探究表明，现在/过去的对立并非出自于自然，而是人为构

建的。观察还表明，对过去同一个时间段的看法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历史学家往往还受到其所生活的时间的左右，这样便会导致对过去的可知性产生怀疑，会导致视而不见现时中的参照（浪漫主义史学家米什莱妄想“完整复活过去”，或者实证主义史学家兰克断言“这些都曾真正地发生过”）。事实上，过去的意义在于启迪现在。过去可自现在去触及（布洛赫的逆推法）。西方社会才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或者说直到 18 世纪才开始重视过去，因为在他们看来，祖辈们的初始时代才是幸福的、淳朴的。西方社会将初始时代想象成了神话时代、黄金时代、伊甸园。世界与人类的历史似乎正在没落，没落理念成为了解释社会以及文明历史的终极阶段的理念。该理念也寄寓在周期性的历史思想中（如维柯 [Giovanni Battista Vico]、孟德斯鸠 [Montesquieu]、吉本 [Edward Gibbon]、斯宾格勒 [1880—1936]、汤因比等人的思想），没落理念是一种历史反动哲学的产物，是一个对历史学科无甚意义的概念。在 17 世纪末及 18 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在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古今之争昭示出一种否认过去价值观的倾向。古代也就成了“落伍”一词的代名词，现代则是“进步”的代名词。实际上，随着启蒙时代的来临，进步理念也得以发扬光大，并一直延续至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这点从科学、技术的发展上来看更是明显。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进步意识形态遇到了一种来自政治的反作用力，该反作用力源自于一种对历史的“反动的”解读。在 20 世纪，法西斯恐怖行为尤其是纳粹死亡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屠杀毁坏以及原子弹等事件，它们都被当成是世界末日的“客观的”历史佐证，上述事件以及人们对西方文化差异的再认识引发了人们对进步理念的批判（Friedmann，《进步的危机》，1936）。人们一度相信有一种线性的、持续的、不可逆转的进步，它可以以同一种模式在所有的社会里出现，但这种信仰实际上已不复存在。无法主宰未来的历史如今遭遇到了处在蓬勃发展中的各种信仰的包围中，如先知、世界末日大灾难、千禧年说（光明革命）等，这些信仰既为西方社会的各宗教派系所坚持，也为一些第三世界社会所固守，这就是末世学的回归。



由于进步观的发展，实证主义观遭到了削弱，但自然科学仍在坚持实证主义的观点，特别是生物学。可以运用进步观来研究社会科学和史学。例如遗传学重新捡起了进化论、发展论，对事件和灾难倾注了更多的关注（Thomas Hunt Morgan）。而史学也可理直气壮地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内用发生（Genèse）这一动态的理念来替代起源（Origines）这一被动的理念，后者也为布洛赫所批判。

28 (5) 现实中的历史学科处在加速的革新之中，在传播这种观点的过程中（主要的推动力来自于费弗尔与布洛赫于1929年所创办的《年鉴》杂志），一种新的史学时间观占据了极大的篇幅。历史是按照不同的节奏形成的，而历史学家的首要责任便是弄清楚这些节奏。但不能浅尝辄止，从时间上看，事件的发生是快速的，这也许是最重要的，但深层次的实际变化却是缓慢的（如地理、物质文化、精神等，一般称“结构”）。这是从“长期”的层面而言的（Braudel）。坚持长期观的历史学家们通过与其他社会学科、自然科学、生命学、经济学、地理学，到如今与人类学、人口统计学、生物学等所进行的交流，其中的某些人形成了一种“几乎静态的”史学观（Braudel, E. Le Roy Ladurie）。人们甚而提出了一种静态史学的假说。反之，“历史人类学”则是坚持运动观，它认为一切客体、一切社会学科（社会学、经济学以及人类学）以及人类社会都处在进化当中。至于史学，它仅是一门关于变迁并对变迁加以解释的学科。结构主义名目繁多，但只要注意两点，史学便可从中得到一些建设性的成果：（a）史学要注意其所借鉴的结构主义是动态的；（b）要运用一定的结构主义手段来研究历史文献、（广义上的）文本，而不是以之来进行确切意义上的解释。不过人们可能会纳闷，拒绝妄言过去、排斥异己、“人云亦云”的史学（Bourdieu）是否是导致结构主义盛行的原因呢？直至走入极左，人们方才认识到，“抛弃过去”（Jean Chesneaux）是危险的。历史学科被誉为“解放过去的手段”（Arnaldi），而在这样的历史学科中，有着“客观意义的”“历史的负担”（Hegel）应能受到制约。